

中国近代两种官派留学 前教育方式的比较

——以沪局和船政学堂为中心

朱孔京

【提要】中国近代早期留学,以沪局和船政学堂为中心,对二者留学前国内教育进行比较可知,沪局的教育只是为出国而临时设立的短期的、规模较小的、课程设置和学习效果较为简单的、培训式的教育,船政学堂的教育则是和近代海防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长期的、课程设置复杂、学习效果突出、专业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两次留学的进程、成效、结局命运以及留学生归国后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通过比较,我们也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早期留学教育的探索和艰辛。

【关键词】早期官派留学 沪局 船政学堂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4-0117-06

19世纪后期,清政府向西方派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留美、留欧学生,^①这一举动,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应变反映,也是中国国内洋务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沪局(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沪局、“上海预备学校”)和福建船政学堂分别是留美和留欧学生留学之前在国内培训和学习的两个学校。考察中国近代早期的这两次官派留学,有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为何同时期的这两次留学成效会有很大的差异?为何留欧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更加切实可行?留美幼童却遭到了撤回的命运?为何同为早期的官派留学生,留美生和留欧生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却有很大不同?

一、沪局和船政学堂设立背景和目的的比较

船政学堂成立于1866年底,沪局设立于1871年,这和当时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外国公使的进京,总理衙门的设立,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及“中体西用”思

想的逐渐形成都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正是由于认识到自己的贫弱以及西方的坚船利炮,一些有识之士才有了向西方学习,派遣学生出洋学习,创办自己的军事、民用工业的思想。而随着幼童留美计划的逐渐成熟和福建船政局的设立,沪局和船政学堂也就应运而生。

但在当时,清政府设立两个学校以及后来派遣学生留学考虑的侧重点明显不一样。设立沪局和派遣幼童留美主要侧重于培养翻译、外交人才以及学习西方先进科技。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清政府与西方国家交涉事务日益增多,急需一批和外国打交道的外交人才。为培养自己的翻译、外交人才,清政府先后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在广州也设有同文馆,但仍不能适应日益增多、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所以派学生去外国学习语言文字,就成为当时解决外交人员短缺的一个应急措施。同时,随着洋务各项事业的兴

^① 这具体指的是1872年~1881年间的四批幼童留美教育和先后于1877、1882、1886、1897年进行的四批船政留欧教育。

办,清政府也急需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在洋务初期,洋务派“自强”的主要方式是购买、仿造西洋枪炮和船舰,但这不是根本之法,因为“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窔,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①要真正掌握西方科技,保证人才的需求,根本的途径还是派人到西方去学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②1871年8月,曾国藩、李鸿章联合上奏,直接指出:“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职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③

船政学堂的设立及留欧生的派遣更多地是出于近代海防意识的增强及海防建设的需要。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都是从海上破门而入。朝野人士逐渐认识到海防空虚、海疆不保的危害性,进而认识到建设海军、加强海防的重要性。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清政府开始了海防建设,由于面临人才短缺和技术问题难以解决的局面,洋务派官员一方面重金雇用洋人,充当技术顾问;另一方面,开办了一些制造厂、船厂,如1865年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1866年创办了福建船政局。这些军工厂陆续制造了一些新式船舰,但不少船舰“系西洋旧式,只可作无事巡防,有事时载兵运粮之用,实不宜于洋面交仗”,^④并且“大宗物价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⑤对此,洋务派官员又采取了直接向西方购买船舰的便捷之策,但所购置的船只大多是西方国家改造维修后转手而来的旧船,“徒糜巨款”,^⑥并且用外国人指导造船、驾船,中国人“虽日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器和制器之所以然”,“倘洋匠西归,中国匠徒仍复茫然,就令如数成船,究于中国何益?”^⑦种种因素使洋务派官员进一步认识到强化海防的根本良策,是要尽快培养出一批中国自身的驾驶和制造船舰的专门海防人才,左宗棠在创立福建船政局时,就认为“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在学”。^⑧随着福建船政局的设立,船政学堂也随之建立起来。“船厂根本在于学堂”,“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⑨船政学堂的设立和后来派遣学生出洋留学更加具体而明确地和近代海防建设联系在一起。

另外,从两个学校最初设立的直接动机上看,沪局的设立一开始就直接和幼童留美联系在一起。在筹划幼童留美时,曾国藩、李鸿章就提出:“至挑选幼童,应在上海先行设局,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选第三、第四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俱以年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收录入

局,由沪局委员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在沪局肄业,以六个月为率,查看可以造就,方准资送出洋”。^⑩也就是说,沪局是为幼童留美而临时设立的专门性学校,随着四批学生出洋留学,它也就存在了前后不过十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船政学堂是随着福建船政局的建立而设立的,左宗棠在开始创办船政局的时候,就有创办学堂的意图:“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需雇请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于定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无论弁兵各色人等,有讲习精通能为船主者,即给予武职千、把、都、守,由虚衔荐补实职,俾领水师。则材技之士争赴赴之”。^⑪后来他更明确提出船政的一项重要事宜就是创办艺局,“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业”,“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⑫船政学堂一开始并非是为出国而设,主要是为了培养自己的造船和驾驶人才,“无论是中国有关当局,抑或是船政局的法国监督们,在制定教育计划之初,似乎都未曾考虑到,日后要从学生中选派一部分人到法国继续深造”。^⑬

①②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4、154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53~157页。

④ “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421页。

⑤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4,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8页。

⑥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4,第1068页。

⑦⑧ “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沈葆楨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138、138页。

⑨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28页。

⑩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等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58页。

⑪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折”,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

⑫ “同治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左宗棠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第285、286页。

⑬ 巴斯蒂:《清末留欧学生——福州船政局对近代技术的输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第950页。

二、沪局和船政学堂设立过程中规模、人事、经费等基本情况比较

沪局和船政学堂在设立初期就存在着规模、人事、经费、生源等各方面的差异。

第一，从人事和师资力量来看，沪局由于只是为幼童出国临时设立，所以人事安排较为简单，“查有盐运使衙分发候补知府刘翰清，渊雅纯笃，熟悉洋务，业经檄令总理沪局事宜”。^① 所以，“1871年，一所能容学生一百名之学校开办于上海山东路外国公墓之对面，第一批教职员为校长刘开生（字翰清），副校长吴子石，中文教员三名：容、陈、黄三君，和英文教员三名：曾兰生与其两子子睦和子安”。^② 包括校长、副校长，学校只有八名教职员，并且英文教员也是汉人，教给学生一些简单的中文、英文和美国的习俗礼仪之类。相比而言，船政学堂则要复杂得多。在人事安排上，船政学堂和船政局一脉相承，采用的是比较完备的封建衙门管理体制，船政学堂归船政大臣统制，首届船政大臣沈葆楨为正一品，并且还权向皇帝直接具奏。船政大臣下常设提调2人，其中一人分管学堂的行政管理工作。各学堂分设监督、稽查或训导具体负责管理，由船政选学有根底，兼通西学，有威望的官员、缙绅担任，另设若干委员分工协助。同时，学堂实行行政与教学分开，教学由聘请来的洋监督、洋教习负责。学堂成立之初，就由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分任船政正副监督，对学堂教育进行监督，但不得干预行政、人事管理，并且对于洋监督、洋教习，也相应赐予官职，纳入封建衙门管理体制。在师资上，船政学堂较为完备，还建立了责任到人、赏罚分明的管理制度。人事安排和师资配备的差异，说明清政府对两个学校重视程度的不同，进而影响到两个学校教育水平、教育程度、教育效果的不同。

第二，从规模上看，沪局由于是临时设立，规模并不大，只“能容学生一百名”（容尚谦回忆），校舍“有两层楼房，大教室、图书馆、餐厅和厨房在第一层，办公室、接待室和宿舍在楼上，中文教师的四方桌放在每间教室的两头，两桌之间是学生的长桌子和长凳子”（李恩富回忆）。相比而言，船政学堂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设施设备上看，都要完备得多。1867年春，艺局迁到马尾，改名为船政学堂，当时就有教学楼两座，学生宿舍60多间，并按学科分班，分法文班和英文班（即前学堂和后学堂。以法国人精于制造，英国人精于驾驶，所以前学堂多聘用法国教习，教授制造专业；后学堂多聘用英国教习，教授驾驶专业）。以后又陆续增加，

到1897年后，共有八所学堂，即造船学堂、绘画学堂、艺徒学堂、匠首学堂、驾驶学堂、练船学堂、管轮学堂、电报学堂。相比沪局的学生培训完后就出国，船政学堂由于生源较为充足，所以后来选派出国学生要在历届学生中进行严格的选拔和考试。

第三，从经费来源上看，幼童留学，通计费用“首尾二十年需银百二十万两”。^③ 关于筹措和运用经费的具体途径，规定：“年需用经费，查上奏定章程，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洋局用款，下年应用之项，于上年六月前由上海道筹拨银两，眼同税务司汇寄外洋，交驻洋之员验收。其沪局用款，即交沪局总办支销”。^④ 其实，这120万两大部分用于幼童在美留学时驻洋委员的薪水、幼童来回的川费及衣物等，真正用于沪局的费用并不多。对于船政学堂来说，经费是列入船政总预算的，由船政统一划拨，所需经费，“就闽而论，海关结款既定，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⑤ 经费从闽海关内酌量提用。并规定“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非厚给月廩，不能严定课程，非优予登进，则秀良者无由进用”，^⑥ “各子弟到局后，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贍其家”，^⑦ 也就是说，艺童在船政学堂学习，经费还是相对有保障的。

三、沪局和船政学堂生源的比较

首先，从招生报名的情况看。沪局的招生就是为了留学美国，开始时，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因此要求“派员在沪设局，访遍沿海各省聪颖幼童”，“入选之初，慎之又慎”。^⑧ 挑选幼童，必须“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其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局考试，如资性

①④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等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58、159页。

② Yung Shang Him（容尚谦），The Chinese Education Mission and its Influence（“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T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vol. 9. No. 3. Oct. 1939. 见译文《真知学报》第1卷第2期。

③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54页。

⑤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第280页。

⑥⑦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第286、288页。

⑧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54页。

聪慧,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局暂住,听候齐集出洋,否则即撤退,以节糜费”。^①实际上,当时的招生非常困难,按章程,应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但很少有人报名。最后招收的学生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为生活所迫的贫穷子弟,一类是来自与洋务有关的家庭。也就是说,沪局的报考并不踊跃,招生并不顺利,由于满族子弟不愿报考,大部分汉族地主子弟不会报考,仇恨洋务的甚至对外国不了解的守旧儒生也不会报考,所以学生的来源大多为家境贫寒之士、洋务家庭子弟、华侨子弟以及西式学堂的学生。船政学堂招生则是为了学习造船和驾驶,一开始就规定“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②并且“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如系文职文生入局学习者,仍准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水营,以昭奖叙,庶登进广而人才自奋矣”。^③这些优惠措施减轻了人们因恐惧这种教育会导致低劣的职业的倾向,所以,从一开始报考就非常踊跃,并进行了严格的考试选拔。

其次,从学生的入学年龄看,沪局的学生年龄都较小,最小者不到10岁,最大者不到16岁,平均年龄约12岁。

相比而言,进入船政学堂时,艺童的年龄比沪局的幼童要大一些,“新生入学年龄,定为十四岁至十六岁”,^④这与我们统计的部分留欧驾驶班的学生入学年龄相一致。

相比留美幼童,船政学堂的学生更能理解洋务派学习的动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年龄大,思想也较为稳定、成熟、务实,能够结合中国现实思考一些问题,将来留学也更能吃苦,经受各种实践锻炼,留学的短期效果好,也符合当时洋务派急功近利的心理。

四、沪局和船政学堂学习程度的比较

沪局虽为出国而临时设立,但从管理、教学方法等方面看,基本上还是封建官学。对于沪局的学习,第二批出洋幼童李恩富后来记叙道“中午时分,进行中文课的背诵。他们(老师)一边用眼角瞄我,一边念着他们的书,使尽力气高声朗读课文。很快地背诵课完毕,不止一两个学生被叫回座位继续做作业,还挨了几下打,为的是激发他们的智力和提高他们的记忆力。”“到了(下午)4点半,学校下课。”“晚饭后照例要用温水洗洗脸。这是习惯。然后把灯点着,等老师来后,40个人全力以赴地准备明天的功课。到了8点,一位老师来给大

家讲一段中国历史”。“第二天早上,吃罢早饭,我们又聚集在同一教室上英文课。”^⑤同批的幼童温秉忠也回忆道:“当时他们没有网球、足球及篮球,也没有这么多假日。那时只有中国阴历年、五月初五日及八月中秋节放假。故在学校读书时间多,而游戏时间少。学校监督是一位‘暴君’,他力主体罚,而且严格执行。但多少年后,幼童们仍然怀念他,他们恐惧他手上的竹板,但是他强迫大家读写中文,在幼童回国后,都能致用不误”。^⑥沪局的教育,由于时间短,任务紧迫,这些幼童除了学习一些简单的中文、英文和美国的习俗礼仪外,最主要的还要学习一些封建的伦理道德,在教学方法上,也是比较粗暴的。

船政学堂在办学之初,就制定了《求是堂艺局章程》,规定“入局肄业,总以五年为限,于入局时,取其父兄本人甘结,限内不得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⑦只是在“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月,度岁时于封印月回家,开印月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⑧船政学堂的课程设置也很有远见,“组织者制定了一套外语、数学、工程学、航海学、以及包括基础和实用的大量技术课程,每一门课程都用英语和法语教学”。^⑨船政学堂的教学管理较为严格,实际上几乎是全年上课。在教材上,除了中文课用本国的四书五经外,专业课一律使用外语教材,用外籍教师上课,教学计划上也是参照英法两国学堂的教学计划设置进行安排。“法文学堂(前学堂)的大部分课程的教学是用法语”,“另外,法文也用于技工的训练和组装、铸造、木工、锅炉、光学等车间工作”,“航海和轮机课程是用英语,因为英语已成为中国海关和海军通讯语言。”“英文学堂(后学堂)主要致力于训练学生的英语、航海和工程学,期望毕业生能驾驭未来的中国舰队”。^⑩尤为重要的是,船政学堂高度重

①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55~156页。

②③⑦⑧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第288、286、288、288页。

④ 陈景芝:《记船政学堂简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第393页。

⑤ 参见“最早的留学培训学校——幼童出洋肄业局沪局”,新浪博客“珠海容阔与留美幼童研究会”,<http://blog.sina.com.cn/yungwing120>。

⑥ 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

⑨⑩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第353、356、358页。

视学生的实习和训练，利用船政局得天独厚的条件，将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如造船学堂的学生每日要抽出半天的时间由外国教师带领进厂实习，绘图学堂的学生每天要用几个小时对船用蒸汽机进行观察和测绘等，驾驶学堂的学生虽然以课堂为主，但毕业以后，都要进行船上实习和远航训练。船政学堂的考试制度也很严格，并和奖励相联系：“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情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励”。^①所以学堂竞争激烈、规定严格，淘汰率也很高。

五、沪局和船政学堂学习效果以及对以后留学影响的比较

首先，对待中文的学习和传统文化的态度。幼童在沪局学习中文、英文最多的也不到一年，而且由于年龄小，中华传统文化对他们影响不深，到美国后很容易西化，这显然和洋务派出洋留学的初衷相违，所以在出洋章程中就明定幼童，“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还规定：“恭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由驻洋之员率同在事各官以及诸幼童，望阙行礼，俾姻仪节而昭诚敬”。^②幼童出洋后，要严格遵守朝廷的定制，刻苦学习汉文。

船政学堂的招生与学习非常重视封建传统教育，在招收学生时要求应考学生具有较高的传统文化知识，在教学中，更是用传统士子的模式规范学生，惟恐他们在学习西方海军技术的同时思想也随之西化。这样，经过5至10年的国内传统教育，留欧时，大都是23岁左右的青年，他们能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进行判断、鉴别，既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又不至于丧失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正如巴斯蒂所说：“这批年轻人身上不存在丧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危险。这是因为从年龄上看，赴欧的学生们要年长的多，而离开祖国的时间又短的多”，^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留欧生表现出更多的稳定性。

其次，从专业学习上，沪局幼童和船政学堂后来的留欧学生更不可同日而语。

幼童沪局学习时间短，所以他们也就只能学习一些简单的英文和美国的一些风俗礼仪。到美国后，基本上

都要重新开始，不但传统思想在他们身上没有打下多少印记，专业上他们也可以接受正规而系统的美式文化教育，接受一些崭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但是，幼童这种西式的中小学基础教育，在中国国内当时的洋务派看来，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不能立即和他们“富国强兵”的目的相一致，这也是导致后来幼童中途撤回的一个原因。

船政学堂的学生经过5到10年的学习、训练，打下了坚实的中英文基础，特别是专业知识更有一定的积累和深度。通过学堂的学习，初步掌握了一些基础科学知识及航海、操作、制造等专业技能，在国内就已打下专业的扎实基础，英语、法语基本过关。出国考试对专业、外语要求也相当严格。船政学堂毕业生赴欧留学，是在已学的专业基础上深造提高，对他们的要求是“既宜另延学堂，教习课读，以培根砥，又宜赴厂习艺，以明理法，俾可兼程并进，得收速效”。^④同时还责成他们将国外新样的“船身、轮机及一切军火、火陆机器，觅取图说，分别绘译”，^⑤汇送国内。与留美幼童相比，“赴欧的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他们懂英语、法语，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欧洲近代科学知识，当然，也具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⑥因此，早期赴欧船政学堂的留学生在出洋学习前，大都在船政学堂里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人数上也有严格的限制，留欧学习目标明确，期限也短。船政学堂的这种初期教育为后来选派船政生赴欧学习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使他们出洋后得以直接进入英法两国的海军及其他军工院校，使自己的专长“精益求精”。他们与早期的幼童留学相比，取得的成效也较快，回国后能直接为国家的海军造船、制造、驾驶等事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暂时达到了洋务派“富国强兵”的目标。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师

责任编辑：赵俊

①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第356、358页。

②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等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58、159页。

③⑥ 巴斯蒂：《清末留欧学生——福州船政局对近代技术的输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第955、949页。

④⑤ “奏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附清单二），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2册）奏稿卷28，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4、1215页。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Pre-overseas-educations Dispatch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aking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Fu Zhou Naval School” as Examples

Zhu Kongjing

Abstract: The overseas study in early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s centered on the different practice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Fu Zhou Naval School”. By comparison of the two pre-overseas-educations, the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the education at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is more of a temporary training, with a short term, a small scale, a simple curriculum and an easy target; while the education at Fu Zhou Naval School is effective, professional and practical, with a long term, a complex curriculum, an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modern naval for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has impact at a certain degree on routes, outcomes, fates, and contributions the students mad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fter they returned to homeland. Moreover, we learned more profoundly the difficulties that the exploration of overseas education in Early Chinese modern history faced at that time

Key words: overseas study dispatched by the government at the early stage;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Fu Zhou Naval School

观点选萃

苏联模式的形成

秦正为

聊城大学世界共运所副教授、博士，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秦正为撰文指出：

苏联模式的形成是在斯大林时期，因而又称斯大林模式。此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反对社会主义存在一定的模式。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坚持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既定的历史环境。为此，恩格斯在晚年没有再系统地去研究未来社会的特征问题，但面对工人领袖的请教，他一再阐述了如下思想：“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无论如何应当声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将特殊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建设模式，后来承认“干了蠢事”，因而尽管也罗列过几种公式，但在新经济政策的探索上则是一直高度谨慎的。列宁一方面坚持要根据现实根本改变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而不要拘泥于书本和字眼，另一方面也主张各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和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反对发展模式的推广和照搬。斯大林在战胜了反对派后，却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完全改变了较为灵活的新经济政策，逐渐形成了固定不变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是伴随着高速重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形成的。通过三大运动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具有鲜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也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重大影响。在经济上，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逐渐发展为单一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不允许其他经济成分存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畸形发展；经济管理政企不分，管理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体现高度的指令性和计划性；否认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强调国家的专政和镇压功能，国家安全机关占据特殊地位、拥有特殊权力；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苏维埃实际成为表决机器；地方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联邦制国家实际上成为单一制国家；领导体制形成金字塔型，领导人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个人崇拜流行，干部委派制、领导终身制和官僚集团逐渐形成；监督机制逐渐弱化，司法机关有法不依，民主法治破坏殆尽。在文化上，实行严格统一的思想文化控制体制。文化思想高度意识形态化，文艺科学均以政治为标准；学术是非由领导言论来衡量，科学研究均受官方意志裁定；实行高度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文化思想管理体系，进行思想垄断和文化钳制；舆论高度统一化、标准化，口号、标语满天飞，标榜自我、贬低他人盛行，资、社对立严重。总之，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集中、行政管理，并且覆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赵俊 摘编）